

一頭蓬髮、一襲布衫、一杯清茶

胡有瑞

訪沈剛伯教授

沈剛伯，湖北宜昌人，民前十五年生，

英國倫敦大學歷史系畢業，國立武漢大學、

中山大學、中央大學、政治大學教授、臺大

教授兼文學院院長，並多次代理校長，現為

中央研究院院士。

沈教授主持學術機構多年，作育史學人

才，成績卓著。

那一頭蕭蕭的白髮，好硬、好直。

沈剛伯教授說：他的個性，就像他的頭髮，不妥協，不服貼。

記得，第一次見到沈教授，立即對他的頭髮留下深刻的印象。硬硬直直的一頭，真是欲衝冠的怒髮，也像是要升天的羽翅。

就是這頭華髮，不知使多少臺大學生為之傾倒，因此，學生們曾將「沈剛伯的頭髮」，列為臺大八景之一。

那天，當我請他說說自己，談談人生時，沈教授



率直地爲自己下了這樣的結論：「我的一生一直抱定；官不可做，書却不可不讀的原則。」

很自然地，他用手在頭髮上搔了搔：「做官的人頭髮要軟，瞧，我這一頭蓬草。」

說着、說着，他更憐惜地順了順自己的頭髮，那隻持慣了粉筆的手，此刻，好柔、好輕地在頭上摩挲着。

他說：這頭髮，就像煞他的爲人，又硬、又直。「我不需要用梳子，梳也梳不直；也不能擦油，擦了油就癢得難受。」

在學校的時候，學生們都愛欣賞他的頭髮。因爲，頭髮的型式，真是天天不同，有時是全體肅立，有時是靠一邊傾斜着。「看老師的髮型，可以知道他頭天晚上睡覺的情況。」

今年是兔年，沈教授是屬猴的，現在正好是七十九歲。他說：「我的頭髮是從五十多歲開始轉白的。」

算一算，那正是他擔任臺大文學院院長開始的那幾年。

一提起那廿二年，沈教授的感觸就好深、好重。「那是我這一生最好的時代，頂好的光陰。」

煩惱的廿二年

在學問上，他稱那廿二年，是自己荒廢的歲月。可是，對朋友和學生來說，大家都認為，那是段值得紀念的日子。

說起去就任那「推也推不掉」工作的原因，實在是基於他對朋友的重信諾的情誼。

「民國三十七年，我原打算到北京大學去教書的，當時的教育部部長朱家驊却力邀我到臺大來組織文學院，所以，我拾着一個皮箱就來到了臺大。」

原本說好幫幫忙的。「可是，當時的莊校長要走，必須推荐一人做校長，當時我就推荐了傅斯年先生和植物學家羅宗洛，結果傅先生做了校長，我也給套上了，第二年，傅校長死了，可是代理的錢思亮又抓住我不放，一抓住可就耽了廿二年。」

擔任了院長職務，行政工作的枷就套在這位學者的頭上。「天天要辦公，上午要辦鷄毛蒜皮的瑣事，下午，一星期要開四天或六天的會，有的時候天天開會不說，連星期天也開，校內的會、校外的會，一天忙透了。」

上完了班回到了家，有時加上應酬，那麼，要提筆寫作或是潛心進修，全要在夜深人靜時。「晚上的

時間太短促、太寶貴了，就這樣，我一直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思寫過一部書。」

對這點，沈教授一直覺得遺憾，他說：「這廿二年，對臺大無益，對我却有損。」

「一個讀書人，有人是既能做學問又能做事，譬如像傅斯年和丁文江，有人是能做學問却不能做事，像胡適，更多的人是只能做事，不能做學問。」

而他形容自己，却是：「一無所長，三流人才而已。」這是他的自謙，也是他的自嘆，因為，就是那廿二年，使他橫溢的才華和滿腹的經綸，只能在課室和講臺上聽到，始終沒有能印集成書。

遨遊史學領域六十餘年

在史學界，沈教授讀書的多、治學的嚴，以及修養的深，一直是受士林推重的。

沈教授說，從小，他就是個歷史故事迷，而六十多年的遨遊史學領域，是幸福，也是陶醉。

「受家庭的影響，從小，我就被培養了對歷史的興趣。」

「我是長孫，祖父極愛我，小時，我全由祖父帶，父親在外忙，經常幾個月見不到面。跟在祖父身邊，成天就是聽故事，背詩文，各種各樣故事聽多了，對古代的事事物物自然就有興趣。」

最早接觸的一本歷史書，是史鑑節要。「四歲的時候，祖父就教我唸，四個字一句，讀起來像千字文一樣朗朗上口。」

「唸完史鑑節要，就讀孝經、小學、論語、孟子、詩經等經書，這一陣子讀得我一點興趣都沒有，完全是讀死書，苦得很，十一歲時，祖父就要我點資治通鑑，這時興趣又稍稍回來，更樂的是，十二歲以後祖父就不管我讀書了，這時我就自己選書看，每天看若干頁，自我摸索和回味，就這樣，我對歷史的興趣，就在無意中培養了起來。」

學術界人士都說，沈教授治史的最大特點，是他先在外國歷史上下過工夫後，才回頭來鑽研中國古代歷史思想的，在方法上獨到，同時也能不落人窠臼。」

他是英國倫敦大學的畢業生，「到歐洲學歷史」，這一念頭的興起，沈教授說：「那是偶然。」

「我在武昌高等師範讀書時，有位美國老師納德默就說：學人文科學應該到歐洲去，西洋文化的根就在歐洲。受到這句話的影響，當我考取湖北公費要出國進修時，就毅然的選擇了歐洲。」

「我們當年出國唸書，跟現在人的想法、做法都不一樣，我們的志向不在學位，只在學點東西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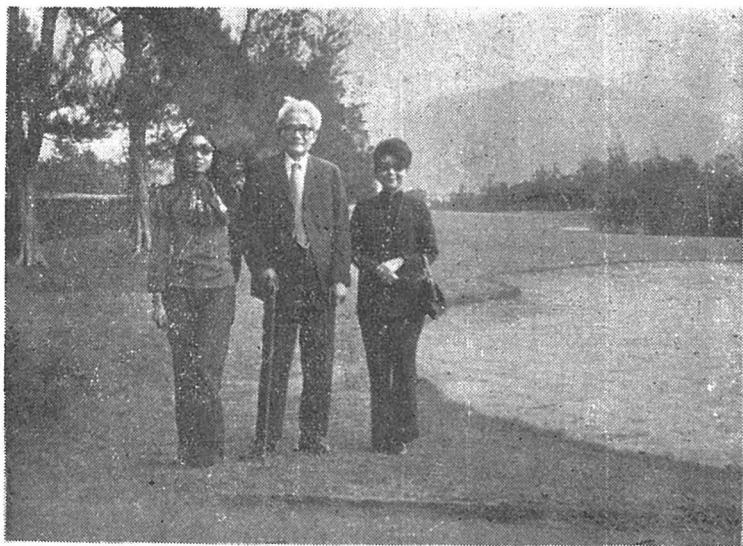
他說：當時到國外讀書的人，多半是採取兩種態度：

——讀學位，聚精會神讀四年或五、六年，取得博士學位，唸人文的比自然科學難，因為，在歐洲要學拉丁文，受到語文的影響，當時的唸書是只能專，無法博。

——採博學方式，每樣都學點，志在學不在學位，那怕是政治、文化、風俗習慣……樣樣都學，「多摸點東西，回來可以整理自己的，也就是利用他們的方法，來整理自己的歷史。」

沈教授說：「一個留學生，如果想持有這兩種態度是很難。我是選擇後者，各方面的知識多學點，將來再應用。」

他回憶着：「那段在倫敦大學的日子中，我選了



沈剛教授與夫人、兒女合影

很多課，也去旁聽很多課，除了歷史、文學的課我喜歡外，我還選了人類學、考古學、連解剖學也聽，真是又博又雜。」

嚮往埃及，愛好考古，這一直是這位史學家的心願。「我是中國人中學埃及古文的第一人。」

年輕時他常常想：「學歷史的人，一定要去看看埃及」。另外他還想：「埃及是擁有最古老文化的國家，同時，如果能將埃及考古的方法學過來，整理我國的文化多好。」

那時，他除了整天躲在大英博物館研究外，就計畫着參加考古隊前往埃及，可惜的是，由於北伐開始，他的湖北官費停止了，只有拎着行李回國。

從民國十三年到十六年，雖然是短短的四年，可是，他一直認為，那是豐富而寶貴的求學生涯。

回到國內，他衷心所想的是：整理中國歷史。「我自己的興趣是在古代史上，不過一回國，最先所教的却是西洋史。」

在武漢大學和廣東大學任教期間，他雖然盡開些西洋史的課，但課餘之暇，仍然手不釋卷，他看的可是全中國古代的史書，「興趣一來就看書，沒有一定

的進度，也沒有選擇，完全是隨興所至。」

來到了臺灣，他的好友傅斯年就硬要他教中國史，「中國古代史，那時沒人教，再說，我自己一直是在研究中國古代史，一開課，就一直教了二十多年。」

研究歷史必須要有材料，從真憑實據中去肯定史實，基於這點，這些年來，沈教授覺得遺憾的是，他的埃及史全丟了。「抗戰以前，還有很多的材料，如今，材料難得，埃及史的研究就只有丟了。」

「歷史是人類的教育，讀史可以使人聰明。」這一直是沈教授愛說的一句話，他用來鼓勵學生，也用來啓迪社會。

研史的樂趣

「研究中國古代史」，沈教授說，「我並不是因為喜歡，實在的原因是，中國史的材料多。我是中國人，對中國的物 and 事，自然會了解得深切。」

在這一長段自我研習的歲月裏，除了教書以外，他完全沉醉在線裝古書的天地中。

「打開書來看，然後找出問題來，跟隨着問題的軸心，去找尋解決的方法。」

譬如，史記上有些說的就和漢書的不同，「這時，問題找出來，仔細地思索，當然，發現問題是不難的，難就難在怎麼解決，因為，材料一不夠，問題就只有懸着。」

有了問題該怎麼辦？「博學之、審問之、慎思之，能問就問，不能問就翻書。」

在這段與古代史問題捉迷藏的研究中，他發現了十個問題，到頭來，不能解決的，倒有九個。

雖然，近代以來，對疑古派來說，是方便了不大發現，儘管是如此，但是對沈教授的研究來說，問題一直就是一層歷史的迷霧，「中國有五千年文化，可是，商以前的歷史就是一片渺茫。」

沈教授常說：我們無法曖昧的接受三皇五帝，不過，不曖昧也不行。

「埃及的象形文，曾用了兩、三千年，不過，埃及的鳥雖然畫得很像，但是中國的鳥早已成字了，由此可見，夏朝文物一定有，可是，要說出是怎麼個形



沈教授剛上台講在

「由此就可以知道，神話是有道理的，只是經過了誇張和渲染而已。」

他指出：人人皆知的大禹治水的故事，細細研究起來，「禹」，這個人一定存在過，只是，那個時代的一切，在歷史上是個問題，除非能在地面上發掘出可以證明的物件，否則，這個歷史問題要解決就難了。

沈教授是位會讀書、愛讀書的學者，老友們都佩服他讀書的勤和讀書的多。但是，這位天天離不開書的歷史迷也承認，很多屬於歷史上的問題，從書本中有時可以找到答案，不過却很難盡如人意。「前些日子，要寫一篇齊國春秋的文章，可是，在書中發現姜太公封的齊，和秦始皇併吞六國時的齊，二者的文化並不一致。」

在層層疊疊的歷史迷霧中，沈教授說：「弄起來是很有意思的。」說完，是一派怡然、陶醉的神態。

象，就太難、太難了。」

在西洋史中，每說到埃及巴比倫的文化，一個王有幾千歲，以前總想，這是神話，但從近幾十年的考古中發現，原來，當時一個小城就有一個王，所謂幾千年的王，就是在同一個時期，有十幾個，甚或幾十個王同時存在着。

由博返約的研史方法

「學問，要有貫穿的必要。」

每一次，當我拜訪沈教授，一再探詢研史和讀書的方法時，他總是堅持要博、要通，然後再掉回頭來才行。

「讀書的第一步就是博覽，然後，再將所讀的連起來貫穿，返回到約，弄些小東西來研究。」

歷史，是屬於人文科學的一環，「人文科學牽扯太廣，也可說無所不涉，譬如，我想寫中國學術方面的文章，遇到了科學，就沒法寫下去了。」

因此，他一再地告訴自己和學生們，治學問的法則就是：「博、貫、約」。

博，不是在專門學術方面求博，而是在工具學問方面講博。

貫，求知的一貫之道，是在自然界及天人之學中，找出一個以簡馭繁的一貫之道，也就是先將每一類的學問，明白一個大概。

「在人的分類學問中，需先研究歷史。因為，一

切文哲、藝術、宗教及一切社會科學，都是人類某一部分行為的研究，而歷史更是古往今來整個人類一切行動的總記錄，如能大致知道人類以往的狀況，自然容易了解人類現在的行為。」

在自然界的一類學問中，沈教授主張應先研究維持宇宙萬事萬物定律的數字，因此，數學又是一切知識的鑰匙。「有了博的工具，再得到貫的本領，就可以約了。」這就是沈教授畢生治史之道。

他一再解釋：必須博與貫後再約，選取一小塊天地作為畢生鑽研的地盤，這才是真做學問。

「有人沒有掌握到這做學問的原則，常常，自己鑽進牛角尖中，浪費一生的心血。」

就以學歷史來說，不是一開始就決定治中國史或是先秦史，「必須自古至今的歷史全要弄個明白，無論經濟史、戰爭史或是唐史、宋史，都必須先讀整個的歷史後，再選取某個片斷，作精心的研究。」

無可否認的，歷史是人類過去的記錄，也是一面鏡子，可以反映人類已往的一切，因此，沉醉在歷史天地中五十多年，沈教授就如同已入定的老僧，他洞悉一切，也就淡泊所有。

有次他曾說過，有些歷史學者窮畢生之力鑽研過去的歷史，也有一些著名的歷史學者是由於研究過去的歷史，而歸納出未來人類活動的趨勢，而他是寧取前者，不取後者。

「斯賓格勒的西方之沒落，湯恩比的歷史之研究，就是研究過去，而歸納出未來人類活動的趨勢，只是，這兩本書只在當時引起一般的重視，但人類的活動並沒有一定的軌跡可循，也沒有簡易而科學的公式可代，所以，歷史學家對未來的預言，在歷史學的研究上，並沒有什麼價值。」

不過，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，由於研究前人的社會型態，活動等等，可以從過去的歷史中找出與現代的關連。由於資料的不足，要從有限的資料中去尋求當時影像的真實也不是件容易事。「任何一個制度的產生，一項政策的推行，其背景往往是極深遠的。」

讀閒書之樂

記得，不止一次考古學權威李濟教授告訴我：「沈教授的演講才華真好。」

李教授說：胡適先生在時就屢屢推崇沈教授的口才。「他不需要講稿，上得臺來口若懸河，那份引人的神態和內容，這一生我只遇到過兩人，一個就是剛伯。」在胡先生心目中的另一位講臺上的天才，是位外國的學者。

這些年來在課堂中，沈教授總是一開口講，不用筆記，也不要查書，滔滔不絕，那口湖北濃濃的腔調，時高時低，總使學生聽得津津有味，欲罷不能。

每逢他舉行演講，老友們都不願錯過機會，每次，朋友們都會說：「那是一次精采的演說，有內容，不聽太可惜。」

當我把朋友的話告訴他時，他總是朗聲笑了起來，笑聲的高昂直衝屋宇，接着，他的大手一擺，搖搖頭說：「算了，這是他們的過獎。」

從第一次訪問他到現在也已八、九年了，每次，電話約定，他總是欣然等待，任何的問題，在他的答語中都充滿了睿智。

退休後，每次去聊天，沈教授都很熱心地關切所有的事，說天下大事、說學術界趣聞，有時也會聊起電視劇、武俠小說等等。

他說：「我從小就喜歡看小說。」

一說完這句話，一分年輕的神采閃現在臉上，他將自己拉回到一甲子前的童年歲月。

「我最早看的第一部小說是聊齋，那時只有十一歲，往後就迷上了小說，背着家人偷着看，那一大陣子，看了不少亂七八糟的小說，像薛仁貴征東、征西等，全是從家中佣人處偷來看的。」

在他的記憶中，西廂記看得很早，而紅樓夢則是到了大學才看的，對紅拂傳，更是記憶深深，他說：「這本書文筆好。」

小說，在他讀書歲月中所占的篇幅是短暫的，可也是深遠的。

「十二歲到十五歲之間，是我一生看閒書最樂的時候，過了十五歲，我全看正經書，遇到閒暇，信手所翻的只有兩種小說——偵探和武俠。」

偵探小說，沈教授愛看外國翻譯的：武俠小說，也只是偶爾看看，他記得，有年在新加坡做考試委員，夜來無事，曾經看過兩本金庸所寫的武俠小說，那真是趣味極了。

十五歲，在沈教授的一生中，是個重要的年份。

「十五歲以前，我讀古書、背經文，真是讀怕了，可是，就在十五歲那年，自己對讀書的興趣濃了，說，而且專喜歡看近代史一類的歷史書。」

在自幼展開讀書的日子中，他的方式是：「偶然做筆記」，而最大的樂趣是：「心裏想什麼，偶然在讀書中在書本找到了，那分高興真是太難描繪了。」

他是湖北人，民國元年，當武昌起義時，他正在鄉下，「我記得，城裏的砲火聽得清清楚楚，那一年沒有上學，我就自己在家中讀了一年書。」

他記得，鄉下的屋宇前，正有棵櫻桃樹，每天，他就手捧着一本書在樹蔭下閱讀。「一面看，一面就伸手摘櫻桃吃」，那無憂逍遙的情景，至今，快八十的老人談起來，仍然神往和陶醉。

根據當年他自修動讀的經驗，他認為，一位學史的人，必定要先唸通史和西洋史。

「通史，一定要通，從古至今都要看；而西洋史更要讀，因為，研究中國的史實，有很多的問題，光就一個國家分析是不够的。」

在沈家，窗明几淨的屋宇中，客廳、書房到內屋

，觸目所見全是書，而且以線裝書最多，一家三口，全是愛書人，沈太太曾祥和女士也是歷史學者，於是，在簡樸、溫馨的生活中，更是書香片片。

淡泊與樂觀

「結廬在人境，而無車馬喧，山氣日夕佳，飛鳥相與還」，這是陶淵明筆下的隱士生活，淡泊、清悠而寧靜，沈教授說，這就是他嚮往的生活境界。

自從退休後，在青田街那幢樹蔭蔽空的日式舊屋中，沈教授過着「甘之如飴」的閒雅生活。

他說：「我現在淡泊上做工夫」。

他坦然地談着，爽心地笑着，一襲布衫，一杯清茶，再襯上那頭著名的頭髮，這就是沈教授和他的生活了。

「我這人平生無大志，我是個平凡人，應該過平凡的生活。」

在史書中鑽研終身，讀得愈多，悟得愈透，這也是沈教授數十年來只追求寧靜不好名利的的原因，他常愛說的一句話是：「古今多少叱咤風雲的人物而今

安在」，因此，他不羨慕成吉思汗和拿破崙的蓋世功名，嚮往的是孔子、耶穌和釋迦牟尼對人類精神生活的貢獻。

「希臘人常說，人生追求道德，與快樂相等，而我們也說，為善最樂。」

「而他為自己所悟出的生活原則是：『使人快樂的，就是善的、美的；由善而美才快樂。』」

他的做法是：一個人要美、要快樂，必須有安寧的人心。「人不能操心，一擔心事就會驚懼，內心就沒有快樂。」

他的結論是：「心要安寧，必須淡泊」，「人要冷靜，心要安靜，眼光才會遠大。」

說到這裏，他環顧着自己的四週，他說：「我一直主張，收入多些，日子過好些，收入少，就該節省着過。」

剛到臺灣時，他就搬入了這幢屋子，「我們一直睡榻榻米，過了好些年，才買床睡的。」他又說，當冰箱已成為普通人家的必需品時，他還用着每天放兩塊冰塊的冰箱。這樣做的目的，在「量入為出」。

他曾對老友們說過，退休後的生活是在考驗自己

，而他定的方向是：心遠、內心實在和無心的境界。

心遠，就是追求陶淵明筆下的清悠歲月，也是一分與自然相結合的生活，他說：「內心有深遠的思想，無論身在何處，就如同隱居於大自然一般。」

內心實在，是指學識的充實和心境的寧靜，那境界正是「心如明鏡臺」的寫照。

沒有心的境界，他的解釋是：達到人我兩忘萬物為一體的地步，也就是佛家所說：「無固無我」，「無恩怨，衆生平等」。

他出神地訴說着，好細心，好虔誠地描繪着一個美好、踏實的未來，和淡泊、樂觀的心境。

不懈的鬪志

就由於淡泊，就由於樂觀，沈教授曾是生命中的英雄——與癌症搏鬥了六年。

七十歲那年，沈教授在例行的健康檢查中，發現患了肺癌。

「開始時，太太和醫生都瞞住我，怕我精神崩潰，當時，我心中直疑惑，爲什麼我躺在床上被搬來搬

去。」

我問他，知道自己得了癌症，那時的感覺，他的回答是輕鬆的兩個字：「還好。」

他說：「人過了七十歲，就隨時可死了，如果，我只活了五十歲、六十歲，我就會害怕，因爲我還活得不夠本。」

人生七十古來稀，人已踏過了「七十」的界限，夫復何懼，而且他又想，一個人如果大限已屆，一場小病就可以奪走性命，基於此，他照常教書、看書、樂觀地生活着。多奇怪，經過了長長的六年，癌好了，他成了自己生命的英雄。

病是好了，可是肺活量也縮小了些，常常他會喘氣不已，儘管如此，好客而健談的他，依然所好的就是家常小聚和擺龍門陣。

而現在，最最令他苦惱的是：「我的眼睛不行了。」

十六年前，身體檢查時，醫生曾提醒過：「眼睛有白內障的現象」，當時，他一點也不以爲意，因爲看得見，看得清，何必掛在心上。

十多年前的警語，到了去年，真正的困擾來了。

「去年，我曾在夜間趕過幾篇文章，眼睛就真的不行了。」

看人，「走近點，我也只能看得模模糊糊的。」

看書，「是不行了，看報紙只能看大標題，看內容只有用放大鏡，到了夜間，遵照醫生的囑咐，更是要閉目休養。」

「看不見」，對沈教授來說，實在太痛苦了。「我們學文史的人來說，退休後的生活會過得更充裕，看看書，寫篇文章，收獲會更多，可是，眼睛看不清，日子就苦透了。」

在告別站立了半世紀的講臺時，他就鄭重地告訴朋友和學生，一定要將全付精神放在書房，完成中國史學史和中國思想史這兩部著作。

浸淫在史學天地六十年，遨遊經書史籍大半世紀，對這兩本書的寫作、大綱、資料和細目，早已輪廓清楚，所缺的就是充裕的時間來靜心構思和提筆。

如今，時間有了，而他却不能提筆，多可惜。

沈太太曾要求他口述，也為他置備了錄音機，可是，沈教授却說：「自己聽聽，總覺得重三覆四的，真不習慣。」他預備去動一次眼科手術，「眼睛好了

，我要繼續寫中國史學史和中國思想史這兩本書。」可是，醫生說，現在還不是動手術的時候，還得等段日子，這將是段令人心焦而痛苦的時間。

沈太太打算，這個暑假，她將記錄沈教授聚了六十年的史學智慧，為他筆記這兩部鉅著，因為，沈太太是學史的，又是沈教授三十多年來的生活伴侶，由生活到學問，都是相知、相慰的同行者。

對沈太太的這一構想，沈教授是勉強同意，不過，他始終認定，有信心，自己會提筆的。

因此，沈教授見到人就說：「要愛惜自己的眼睛。」

他將自己眼睛的病因，歸結於當年透支太多。「要記住，晚上要少看書，光線一定要充足，可不能因為貪書，而使眼睛受到委屈。」

這麼些年來，我已經無數次叩動着那株麵包樹葉子覆蓋下的木門，每次，隨着那聲濁重的湖北腔出現的就是那高大，穩重而凜然的身影。每次，愉愉快快的敲門，歡歡喜喜的離去。只是最近，想到他的眼病，聽到他滿懷熱切的聲音，心中總覺得他的眼睛根本不該有病的。